张明明，温辰煜．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长效机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5）：29-39.
Zhang Mingming，Wen Chenyu.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long-term mechanism of new-quality farmers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5）：29-39.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5.004

# 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长效机制

张明明，温辰煜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在乡村振兴中，新质农民既具有先进的劳动理念，又掌握较强的劳动技能，体现了劳动者素质与生产力性质变革的辩证统一。新质农民作为具备现代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核心力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人才队伍、创新文化产品、提升绿色水平、推进数字治理，全方位赋能乡村“五个振兴”，为乡村全面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当前，我国依靠培养新质农民来推进乡村振兴具备有利条件，但同时面临新质农民人才队伍短缺、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失衡、村民数字素养不足等现实梗阻，这些因素对新质农民的驱动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需通过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体系、完善乡村人才培养链条，强化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力度、夯实数字乡村发展根基，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缩小发展差距，培育村民数字治理意识、提升乡村协同治理效能，为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提供长效机制。

**关键词：**新质农民；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5-0029-11

## 一、研究背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把“三农”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谋划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养数字人才和电商人才[1]。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健全乡村人才培养发展机制，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壮大各类农村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队伍[2]。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引导鼓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3]。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次质变，“是源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产业的深度升级转型而形成的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优化组合提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为根本标志的创新驱动型生产力，关键是质量提升，本质上是先进的生产力”[4]。其中，劳动者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具备创新素养、技能储备、经验丰富的新质劳动者。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数字经济时代，新质农民作为新质劳动者在乡村场域的核心承载主体，更具备新思想、新观念，既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因素，又是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协同发展的核心力量，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质农民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主动学习农业知识和技术，敢于直面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新问

**收稿日期：**2026-01-04 **修回日期：**2026-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架构及其效应评估研究”（24BKS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统一大市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实践路径和制度保障研究”（25CJL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变革研究”（23XJC710011）
**作者简介：**张明明，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新质生产力。

题，并积极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进行解决，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与自主意识。同时，新质农民掌握了更多适应当前农业发展及未来农业发展方向的劳动技能，拥有更先进的认知能力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能利用当前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素质以及管理、融通、协调、策划、宣传推广等劳动能力[5]，以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经营与乡村发展全过程，体现了劳动者素质与生产力性质变革的辩证统一。例如，在数字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新质农民的涌现提高了技术融合能力，发挥了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也极大地创新了农业组织方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推动了乡村振兴。

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用“新质农民”为学术衍生概念，指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具备数字技术、绿色经营能力、可匹配AI、生物育种、数据要素等新技术与新农业态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是“高素质农民”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进阶表述。

当前，学界对于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质农民的内涵与类型的研究。李小贤指出，新质农民是具有较高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从业者，他们既包括新型职业农民，也包括农业全产业链上的电商人才、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和农业管理人员等[6]。谢沙、李恩来认为“新农人”是高素质劳动者，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性力量，其饱含的乡土情怀是他们扎根农村、主动求变、建设农村、发展农村的不竭动力。为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育一批真正“懂农业、会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7]。二是新质农民对乡村振兴作用的研究。既有研究多从乡村产业振兴的角度展开，学者宋长鸣等认为以新质农民发展农村电商可以延伸乡村产业链、拓展农产品销售场域，对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8]。张慧泽、高启杰认为乡村振兴重在人口充实和人才振兴，乡村人才的发展要注重内生发育和外部引进并举。乡村内部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带头人等为重要内容，而外部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也更加凸显其现实意义。新农人不是替代农民而是与农民共同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就业的多重发展，在乡村人才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9]。三是新质农民的培育路径研究。学者庞馥珊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征程上，应全链式设置职业院校“新农人”培育的专业体系，全链式组织职业院校“新农人”培育的教学内容，全链式打造职业院校“新农人”培育的平台资源，并且通过这些措施来培育新农人[10]。杨爱青认为目前我国农民数字素养存在数字技能认知、数字学习深度不够，数字生活场景单一、数字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并据此从构建普惠性资源服务体系、培育互联网思维方式、增强数字使用意愿和加强农村干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提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11]。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新质农民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具有理论和现实借鉴意义，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现有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阐述新质农民作用于乡村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缺乏对“五个振兴”的整体性分析。第二，在新质农民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的探讨层面，现有的研究多数都是对于现象的描述以及提出对策建议，并没有深入揭示出新质农民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第三，现有研究提出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系统化、完整化建议，并未对机制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质农民的全新视角，探讨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长效机制，丰富和拓展新质农民的理论内涵与理论支撑。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一是系统分析了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在产业振兴、人才聚集、文化创新、生态保护与组织治理五个方面的赋能路径，尤其是在文化振兴与组织振兴中突出了新质农民的关键作用。二是突破单一视角，整合政策、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重因素，提出了与现实梗阻一一对应的长效机制，形成保障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案。

## 二、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乡村振兴由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组成，这“五

个振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尤其是有数字技术、有管理能力的新质农民。新质农民通过作用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实现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从而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一）新质农民通过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农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产业结构单一，在农村从事农业没有奔头，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率先繁荣乡村产业。新质农民作为有互联网思维、市场思维的新型职业农民，可以突破传统产业局限，通过构建新型模式、创新经营理念、发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力量。一是构建新型模式，推动产业融合。新质农民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一方面，通过“农业＋电商”的新模式将农产品消费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进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幅提升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满足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推动农业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另一方面，通过“农业＋旅游”的模式，以农村大自然风光为载体，打造特色民俗、特色自然体验来增加农业的经济价值，从而推动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因此，通过构建新型模式，能够加快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推动产业集群的扩大，有利于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二是创新经营理念，赋能产业升级。新质农民凭借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对乡村产业传统经营模式进行系统性创新。在既要发展产业又要保护生态的双重目标下，新质农民将现代绿色环保理念嵌入乡村产业经营的全过程，通过引入绿色清洁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体来说，新质农民利用技术创新重塑产业链条，减少每一环节的废弃物排放，提高产业“含绿量”，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向绿色化、多元化优化升级。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发展特色产业，夯实产业兴旺根基。新质农民借助数字技术，立足乡村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与生态旅游、文化传承等新业态的融合，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与价值增值，进而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形成“特色产业引领、多元业态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可以说，新质农民通过数字技术驱动、依托特色资源的产业发展模式，不仅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激活了乡村经济的内生动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二）新质农民通过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新质农民作为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本。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新质农民通过三个方面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注入不竭动力。首先，示范引领本土人才，夯实人才振兴根基。新质农民与传统农民相比，兼具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通过线下组织培训活动，线上利用数字平台进行知识获取、传递和共享，新质农民将他们所掌握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其他农民，并让当地村民真切看到新技术带来的收益，以此带动更多农民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加快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新质农民不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知识和技能的广泛传播，还不断积累更多经验，增强“干中学”的效果。其次，吸引外部优秀人才，补齐人才结构短板。随着乡村振兴工程的全面推进，农村日益成为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城市优秀人才带着技术和资金投身乡村振兴，充实了乡村人才队伍。他们拥有较强的创新思维，通过应用新技术和创新创业模式，将更多人力资本投入农村，而乡村振兴带来的广阔机会，会进一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另外，教育对人的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质量劳动力，选择到农村创业就业，可以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为乡村注入新活力。这些人成为新质农民的典型代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最后，构建人才发展生态，筑牢人才发展沃土。农村不仅要有自己的“土专家”，还要留住优秀人才，政府应加快构建政策、

服务、文化相互协同的“留才体系”，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的“高获得性”与“低成本化”。在政策上，推动完善创业补贴以及入股分红等激励机制，让人才的收益与自身的贡献挂钩，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在服务上，为随迁子女提供优质教育，并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在文化上，定期举办文化活动，增强人才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更多新质农民愿意留在农村，服务乡村振兴。

**（三）新质农民通过创新乡村文化产品，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在乡村场域，创新乡村文化产品能够营造出崇尚文明的文化氛围，凝聚村庄共同体意识，为乡村文化生态繁荣注入新鲜血液[12]。新质农民作为乡村文化产品创新扩散过程中的领导者，明显具备素质方面的相对优势。新质农民利用现代科技创新，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延长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产业链条，扩大乡村文化包容性，创造丰富的文化产品，让乡村文化与时俱进，焕发生机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第一，新质农民能够丰富乡村文化的内容表达形式，推动技术创新外溢。新质农民借助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文化载体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将创新内容展示给村民，带动村民提高创新意识，使“土味”文化焕发生机活力，进一步释放文化创新的魅力。例如，新质农民借助无人机航拍乡村文化活动，用“短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记录乡村节庆、传统手工艺制作等，将乡村文化内容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现给更广泛的受众，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13]。第二，新质农民能够系统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实现知识创新外溢。随着越来越多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的年轻人加入新质农民队伍，他们将传统乡村文化与流行文化结合，利用数字采集、三维建模、元宇宙等高新技术手段，建立知识图谱，对非遗项目、方言歌舞、民间艺术等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转化，并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将其打造成乡村文化数字IP，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乡村文化的产业附加值，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发展模式。依托本土情怀与文化认同，新质农民发挥聪明才智，把文化资源与乡村空间进行跨界融合，拓展乡村文化应用场景，助力实体数字IP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同时，新质农民还积极引导当地村民参与文化IP的创造，以艺术化表达手法呈现乡村独特的文化基因，最终形成IP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14]。第三，新质农民能够提升乡村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促进产品创新外溢。新质农民熟练掌握数学、计算机等基础应用，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能够极大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深度、艺术水准和情感表达，推动内容创作更加贴近现实、呼应时代、打动人心[15]。新质农民的高科技赋能能够精准把握乡村文化产品的创新方向，创新更多新产品、新服务、新内容，推动乡村文化产品的供给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泛化”升级到“精品”，更加符合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多元化、品质化需求，不断增强市场影响力。

**（四）新质农民通过提高乡村绿色水平，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振兴就是不全面的。新质农民是提高乡村绿色水平、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实践者，他们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掌握绿色农业技术，能够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农业农村生产的全过程，推动乡村绿色转型，助力乡村生态振兴。第一，新质农民有较强的生态环保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在绿色发展观引导下，新质农民深刻践行生态理念，对农耕文化的认同以及在农业生产、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体现的创新性，把手机当成“新农具”、直播当成“新农活”中体现的引领性，会使其更容易意识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保护好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活环境[16]。第二，新质农民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中，新质农民作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化变革的核心力量，摒弃了粗放式的农业灌溉方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转而采用智慧化精准作业，厚植农业绿色底色。以往粗放的灌溉方式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导致水土养分流失，通过互联网传感器进行土壤检测并且结合大

数据进行分析，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管理。这种智慧化精准作业重塑农业生产体系，确保农业全产业链条绿色化，从而生产更多绿色有机农产品，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筑牢绿色根基。第三，新质农民与基层干部共同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新质农民与村干部集体将生态文明纳入村规民约，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宣传，打造生态宜居美好乡村，从源头上让村民共同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同时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贤组织，通过投入资金来修复当地被破坏的乡村生态环境，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新质农民通过这些方式提高了乡村的绿色水平，保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17]。

**（五）新质农民通过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保障乡村组织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可以通过健全村委会、社会组织等多元组织体系，搭建政府与村民的沟通桥梁，精准落实相关政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新质农民具备一定的数字技能和培训经验，可以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第一，调动村民治理力量，促进乡村从“粗放式管理”到“精准化治理”。新质农民依托智慧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化社区管理系统，将外出务工及留守村民聚集到一起，共同参与村里的重要决定、生产活动，实现了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化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精细化，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凝聚力，有效保障了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第二，释放基层政府治理力量，推动乡村从单边治理转向交互式治理。高校毕业生、农业科研工作者等新质农民掌握一定的人工智能算力，能够精准采集和有效分析各类信息资源，助力基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以及相互协作，推动基层干部打造数字平台服务终端，清晰梳理各种乡村事务，促进基层政府根据各自职责分配任务清单，进行快速响应和处理。在新质农民的帮助下，基层政府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反馈机制，可以第一时间响应村民诉求，提高了乡村治理效率和村民满意度。第三，发挥社会组织治理力量，助力乡村从“非正式管理”到“标准化治理”。新质农民通常拥有较高学历学位、职业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能够整体提升乡村社会组织人员素质，大张力、快节奏、多梯度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增强乡村社会组织工作事务的规范性和科学性[18]。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组织的骨干，新质农民能够利用知识优势和信息渠道，将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转化为村民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与操作细则，在矛盾调解、环境整治、文化建设等领域推动形成公认的行为标准与程序规范，为基层党建和公共服务贡献重要的智力和活力。

## 三、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现实梗阻

新质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人才队伍、创新文化产品、提升绿色水平、推进数字治理来推动乡村振兴。然而，当前新质农民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面临着新质农民人才队伍短缺、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以及村民数字治理意识淡薄的现实梗阻，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推进效能。

**（一）新质农民人才队伍相对短缺**

新质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其队伍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到振兴的进程，但当前人才队伍短缺的问题突出，影响乡村振兴的质量。一是人才结构失衡。尽管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已达3286万人，但是与6500万人的人才需求规模相比，缺口仍超3200万人，特别是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尤为严峻①。此外，乡村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电商、初级加工等领域，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素质农民数量已超过2000万人，但相较于2亿多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比仍不足10%②。符合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素质农民能力还有待提高。在产业发展的能力方面，一些农民在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以及品牌建设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明显，严重阻碍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产业链的整合和延长。另外，他们还缺乏产品定位与质量维护等方面的知识，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适应能力不足[19]。二是本地人才转型滞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5》数据显

① 数据来源：由《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整理得到。

② 数据来源：2025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2501/P020250107332043203335.pdf.

示，2024年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中，60岁以上的占30%，初中学历以下的比例接近40%[①]，乡村本土农民老龄化突出与结构失衡的矛盾突出。而且，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他们更习惯依赖于“经验种植”的传统模式，对于现代的农业技术设备缺乏学习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农民的转型意愿不强，对于新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担心学习新技术浪费时间而且对转型之后缺乏信心。三是外部人才引进困难。乡村产业长期以传统种植为主，产业链短且附加值低，缺乏可以承载高端人才的优质产业。相较于城市的互联网以及金融的高端产业，乡村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低，对于返乡创业的技术人才缺乏足够吸引力。即便有短期创业的人才返乡，也经常会因为乡村产业附加值低以及发展环境差而选择离开，导致外部人才引进困难以及外部人才流入不稳定。

**（二）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而现实中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质农民无法在农村地区有效应用数字技能，不利于推进乡村振兴。一是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周期长、回报慢。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而政府提供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支撑乡村振兴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除此之外，在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当中，还存在资金浪费以及发展规划没有结合实际情况的问题，这些设施建设耗费时间长、建设工程量大等都造成了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二是数字鸿沟现象突出。在江苏省数字乡村试点过程中通过数字乡村“224”工程建设，即建设大数据管理中心和分析决策中心两个中心，打造“三农”手机端、数字乡村电视端两个客户端，设立乡村治理平台、休闲农业平台、品牌建设平台、数字监管平台4个数字化平台，为数字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20]。但是由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截至2025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虽然已达69.2%，但仍远低于全国79.7%的平均水平[②]，与全民普及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形复杂，依然存在信号盲区。这些地方往往面临着网络信号弱、覆盖不全、接入速度慢等问题[21]，难以支撑新质农民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三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短缺。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覆盖了信息技术与农业工程技术等各领域人才，需要具备更多方面的综合知识。但是目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乡村新型基础设施领域高技术人才依然欠缺。2024年我国乡村劳动力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不到4%，即使是高中程度及以上的也仅占15%[③]，导致农民对智能设备操作不够熟练，在新兴数字技术应用问题上难以适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制约了智慧农业发展，阻碍乡村振兴。

**（三）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目前，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制约着新质农民的健康成长，对乡村振兴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城乡服务设施配置失衡。农村的教育资源远远落后于城市，返乡人才的子女很难获得优质教育。2023年末，乡村医生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比例仅为12%，持证医师占比仅为40.8%[④]，乡村医疗水平较低，无法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除此之外，农村的养老体系不完善，农民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高。2021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认为设施齐全的仅占37.2%，认为服务完善的仅占37.6%，认为活动便捷的仅占35.0%，认为队伍健全的仅占34.4%[⑤]。新质农民的组成不仅包括本土农民的转型，而且还有返乡创业和城市的技术人才，但是乡村的核心资源配置与城市相比差距大，很难

① 数据来源：由《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5》整理得到。

② 数据来源：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5/0730/MAIN1753846666507QEK67ZS9DH.pdf.

③ 数据来源：由《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5》整理得到。

④ 数据来源：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c100133/202408/0c53d04ede9e4079aff912d71b5131c/fles/1734002454304_67772.pdf.

⑤ 数据来源：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 .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1877/part/19971.pdf.

成为新质农民的选择地。二是城乡数字赋能水平不均。城市的数字服务比较完善，居民能够凭借完善的数字服务比较快速地获取信息，然而对于农村的新质农民来说，滞后的公共服务导致他们难以及时捕捉市场动态。例如，城市的数字政务服务平台可以高效办理各类业务，但是对于农村而言，农村的政务服务数字化程度低，大部分业务都需要线下多次办理。这种差距使得农村产业始终难以与城市产业形成协同发展的态势，新质农民推动的乡村产业难以融入更大范围的产业链、价值链，最终会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三是城乡服务保障机制差距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多元保障体系，除了政府投资以外，社会资本以及公益组织都广泛参与，可以根据居民需求提供多样化甚至个性化的服务，然而乡村的公共服务保障模式单一，过度依赖政府，社会资本参与程度不高，很难精准对接居民的实际需求。城市与乡村服务保障机制的差距过大，使得新质农民不愿长期留在农村。

**（四）村民数字治理意识淡薄**

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拥有数字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农村地区老年人受限于意识固化、文化有限以及适应性差等制约，缺乏掌握数字设备的能力，缺乏数字意识[22]。村民的数字治理意识淡薄不利于新质农民开展工作，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一是农民数字素养偏低。农民的数字素养不仅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而且会直接影响数字农业强国建设的成效。农村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民数字技能水平不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高达37.5%，从职业类型来看，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仅18.6分，比全体人群平均得分43.6分（满分为100分）低57%[23]，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类型群体。农民数字素养淡薄，数字活动参与度不高，而且主观上仅把数字设备当作娱乐的工具，在生活中较少利用数字设备参与乡村事务[24]。二是数字培训体系不健全。村民数字素养偏低，应该提高其数字素养，从而帮助新质农民更好地开展工作。但是目前对于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样化以及个性化需求。此外，即使是有培训的体系，但是现有的培训体系将理论束之高阁，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民实际操作应用的需求，而且培训的内容与农民实际生活脱节，很难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三是数字技术应用成本高。数字应用技术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又包括隐性成本。从显性成本角度来看，关于智能终端的采购以及网络服务费用的支出都是显性成本。这些成本的支出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失衡，部分低收入家庭难以承担，会被排斥在数字治理体系之外。从隐性成本的角度来看，数字技能的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而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偏高，对于掌握数字工具的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数字技术应用成本高直接导致村民不使用数字技术，进而阻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 四、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当前新质农民在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现实梗阻，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推进效能。亟需通过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体系、强化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培育村民数字治理意识等长效机制，充分释放新质农民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长效机制进行评估与可行性讨论，保障该机制有效长期运行。

**（一）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体系，完善乡村人才培养链条**

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人才的大力支持，应加快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助力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一是政府要统筹规划，扩大新质农民培育规模并优化队伍结构。各级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明确新质农民培育的目标与任务。以培育生产型、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和乡村治理人才及农业职业经理人为目的，针对不同的群体分层次、分类培养。对于返乡大学生和具有技术优势的高素质农民，应加强对他们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于村委会成员、乡村教师等乡村治理和社会事业带头人，应该加强他们的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责任感和文化素质，鼓励他们为乡村建设做贡献，实现个

人价值和奉献社会的高度统一。通过各类群体的培养，激发各方面人才的活力，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优化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培训效果[19]。二是农村合作社以“看得见”的效应激活本土农民转型。对于本土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村里的合作社可以通过开展“转型试点示范田”，让农技专家全程指导，给村民讲解农业技术知识，通过提高技术实现降低成本与增加效应的效果；推出转型激励政策，对于可以主动参与技能培训的农民给予相应补贴，对于转型后要开展特色种植以及农产品电商的农民提供税收减免，降低农民转型门槛。通过以上方式，农民不仅能够学习到专业的农业技术知识，而且可以增强转型意愿，从而实现农民增收。三是企业要打造优质龙头产业载体吸引外部人才。企业主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构建有吸引力的人才发展平台。一方面，企业要提升产业自身吸引力，推动“农业＋旅游”“农业＋数字”等业态融合，通过延伸产业链与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技术研发、电商运营等岗位来吸引外部人才；另一方面，企业要主动联合政府，通过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推出乡村人才专项补贴，在薪资、住房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倾斜，对带技术和带项目返乡的人才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与场地支持；完善发展保障环境，健全乡村基础设施，搭建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同时宣传返乡人才成功案例，营造尊才爱才氛围，稳定人才流入。

**（二）强化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力度，夯实数字乡村发展根基**

要使新质农民发挥驱动乡村振兴的作用，就必须加快完善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乡村的发展根基，为新质农民掌握数字技能提供重要保障。一是要拓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政府作为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主体，提供的资金较为有限，应以投资入股、分红的形式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与此同时要创新投资融资模式，主动开发新的信贷金融产品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并不断扩大业务范围[25]。除此之外，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并对返乡创业人才提供创业启动资金补贴，通过这些资金的投入起到撬动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降低信贷风险。二是加强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提升农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覆盖率与服务质量。为缩小数字鸿沟，企业应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尤其是加强对偏远地区5G基站的建设与维护，但由于偏远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所以在依靠企业的同时，应强化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政府要出台专项补贴政策，对偏远地区的5G基站建设与维护给予资金补助，降低运营商建设的运营成本，并且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偏远地区的基站选址，缩短建设周期。通过落实终身责任制，明确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质量责任，制定差异化验收标准，结合新基建技术特性，增加数据传输稳定性、系统兼容性、安全防护等级等专项验收指标。三是建立完善乡村人才培养合作社，提高农民应用新型基础设施的能力。依托乡村合作社设立数字技能实训基地，开展智能设备操作、农业大数据平台使用等针对性培训，帮助农民掌握更多的现代信息技术，增强农民应用新型基础设施的能力。合作社还可以引进相关技术人员帮助农民积极主动了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知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5]。

**（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缩小发展差距**

公共服务质量影响新质农民是否愿意长久留在农村，因此必须推进城乡服务均衡供给，缩小公共服务发展差距，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要优化城乡服务设施配置，强化县域义务教育以及医疗远程协作网络建设。在教育方面，政府要推动乡村与城市义务教育的标准化建设，将乡村办学的硬件设施向城市看齐，并给予优秀教师购房、职称评定等政策支持，鼓励其去乡村任教，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在医疗养老建设中，加强县域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专业培训，派遣县级医院业务骨干到乡村社区挂职，提高基层人员专业水平，养老制度同步落实城市同等保障，确保新型农民无生活之忧[26]。二是要打造城乡一体化服务平台，提供与城市均等的发展机会。加快促进城乡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功能互补，重点向农村地区开放，并鼓励村民积极下载，派遣技术人员给予相关的软件应用指导，从而实现快速在线申请，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还可以缩短与城市之间的差距，真正做到农村与城市的互联互通，共享

优质公共服务。三是完善乡村服务保障机制。对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带来的额外支出，构建专项补贴以及创业扶持的双重保障体系。针对新质农民在教育、医疗以及生活消费所造成的额外开支设立专项生活补贴，缩短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在创业就业扶持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针对返乡创业的新质农民，设立专项创业启动资金补贴，根据创业项目规模、带动就业人数、产业契合度等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通过这些举措，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四）培育村民数字治理意识，提升乡村协同治理效能**

村民数字素养培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关乎新质农民的综合素质。培育村民数字治理意识需要多方合力，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开展数字技能普及，强化数字意识引导。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广泛应用，积极开展数字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村民自觉接受、主动学习数字技术。在主动学习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畅通信息渠道，扩大村民的社交网络，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助力村民破除沟通壁垒，破解村民“政治冷漠”问题，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27]。二是精准识别培育群体，实行差异化数字素养提升措施。由职业教育机构、培训中心等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农民开展分层培训，重点加强对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数字帮扶，开发方言版、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应用。与此同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完善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模式，提供包括手机App应用、实用数字设备操作、数字政务参与等在内的培训课程[28]。三是降低成本，激活数字参与动力。对低收入的农民购买智能终端给予补贴，联合运营商推出农民特别优惠流量套餐与通信服务，降低农民支出费用，同时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应用，增加方言引导功能，依托大数据开展集中培训，减少时间成本。组织返乡青年与老年农民结成帮扶对子，手把手协助业务办理。打造数字便民示范点，开展设备体验活动，让村民直观感受数字工具效能，打破成本约束。

**（五）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可行性保障**

以上所构建的长效机制有助于破解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现实梗阻，然而机制能否持续运行，并长久发挥作用，是必须讨论的问题。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要想实现有效果、高质量与可持续运行，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多元的保障机制与可靠的风险防控策略。一是构建涵盖效率、效益、公平的多维协同成效评估体系。就效率而言，建立“新质农民个人能力成长值”“乡村振兴程度”等效果导向指标，衡量机制的投入与产出结果。就效益而言，主要是考察机制运行的实际效果，包括新质农民在产业升级、文化产品创新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的贡献、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就公平而言，引入第三方社会评估机构对乡村振兴发展成果的共享成效进行监督，将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参与感、获得感作为核心衡量因素。二是健全多元投入的可持续性保障机制。在资金保障上，地方各级政府需要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为新质农民在农村大展身手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同时，创新投资与融资模式，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以及社会资本通过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投资乡村新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制度保障上，地方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在机制的长效运行中要明确权责边界，建立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强化问责与激励。各级政府应根据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质农民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支持。三是重点加强防范数字排斥和技术依赖风险。一方面，防范“数字鸿沟”加剧社会排斥的风险。在推广数字技术的同时，必须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培育计划，提供适合不同文化水平和年龄阶段的数字服务，将数字技术惠及所有村民，使村民共享数字技术的便捷性，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要规避技术依赖的风险。新质农民在应用技术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改变技术万能的思维倾向，理性看待技术的赋能作用，避免陷入“唯数据论”“唯技术化”，使技术进步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 五、结语

乡村振兴对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关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未来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以“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为理论和实践指导，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新质农民的支持，新质农民通过赋能“五大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尽管本文对新质农民驱动乡村振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本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仅未能深入探讨不同区域新质农民的差异，而且缺乏完整的数据支撑新质农民对于乡村振兴的驱动效果。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增加区域对比，结合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进行分析，并且借助相关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说服力。只有持续完善新质农民的培育与保障体系，破解存在的现实问题，才可以充分发挥其潜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

###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N]. 人民日报,2025-01-23(01).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5-02-24(01).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01).

[4]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801.

[5] 尤亮，田祥宇. 农业新质生产力：现实逻辑、内涵解析与生成机理[J]. 经济问题，2024（6）：27-35.

[6] 李小贤. 数智时代数字新农人培育的策略研究[J]. 农业经济，2025（10）：90-91.

[7] 谢沙，李恩来.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新农人培育的路径探索[J]. 教育与职业，2025(14)：65-73.

[8] 宋长鸣，刘笑，章胜勇. 深化农村电商发展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J]. 宏观经济管理，2025（2）：58-65，76.

[9] 张慧泽，高启杰. 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21（2）：121-125.

[10] 庞馥珊. 职业院校“新农人”培育路径研究——基于农业全产业链视域[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30）：25-29.

[11] 杨爱青.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4（1）：98-105.

[12] 贺莉莉. 乡村文化振兴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优势、障碍与进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1）：36-43.

[13] 张大维，邓华. 形塑文化主体性：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内生发展路径[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3）：120-131.

[14] 宁德鹏，谢思琪. 乡村振兴背景下“短视频＋直播”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25（6）：145-152.

[15] 王华丽，彭正德.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文化现代化：作用机理、隐性风险与优化路径[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5（5）：135-144.

[16] 车思雨，金晓彤，盛光华，等. 乡村生态振兴的“新引擎”：新农人的绿色价值创造[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8）：148-156.

[17] 岳红伟. 凝聚新乡贤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2025（9）：112-115.

[18] 梁健.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进路[J]. 新疆社会科学，2025（2）：136-143，172.

[19] 王维国，刘亚宁，思敏康. 农业新质生产力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底层逻辑、面临挑战及应对策略[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4)：11-21.

[20] 徐成铭，肖霞，王洛忠. 数字乡村试点对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影响——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J]. 改革，2025（11）：132-146.

[21] 陈健，王丹.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2）：99-107.

[22] 郑永兰，周其鑫. 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5）：43-52.

[23] 李晨赫. 乡村振兴亟待弥补“数字素养鸿沟”[N]. 中国青年报，2021-03-16(05).

[24] 张国磊，龚蕊，王晓宇. 数字乡村治理：名实分离与优化路径——基于S省P县的调研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3）：93-102.

[25] 刘建荣，刘丹.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研究[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25（1）：42-47.

[26] 王颂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实现方式[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5）：97-104.
[27] 王小华，吴双虹．化“数字”为“数治”：数字素养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1）：62-71.
[28] 张增辉．农民数字素养的收入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求索，2024（5）：147-155.

##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long-term mechanism of new-quality farmers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Mingming，Wen Chenyu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core task of "agriculture，rural areas，and farmers" work in the new era，and is crucial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new-quality farmers not only possess advanced labor concepts but also strong labor skills，embody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quality of laborers and nature of productivity. As a core force equipped with modern competence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new-quality farmers empower rural "five-sphere revitalization" in all dimensions—b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strengthening talent pools，innovating cultural products，enhancing green development levels，and advancing digital governance—thereby injecting endogenous impetus in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Currently，China possess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ultivating new-quality farmers. However，it also faces practical obstacles such as a shortage of new-quality farmers，lagging new-type rur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imbalances in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s，and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among villagers. These factors adversely affect the driving effect of new-quality farmers.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trinity-based collaborative training system to improve the rural talent cultivation chain；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new-type rural infrastructure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promote balanced supply of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s to narrow development gaps；and foster villagers′ awareness of digital governance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rur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ese measures will provide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new-quality farmers to dr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New-quality farmers；Rural revitalization；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New-quality productivity